

郑观应的教化思想

张君玉 李 锋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 海南 海口 570105)

摘要: 郑观应继承了传统的“立君为民”思想, 认为要改变当时君民相隔、民隐不达的状况, 必须“力为图治, 亟行教养”。他一方面把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重要的民众教化内容, 希望改变“教养失道”的局面, 另一方面高度重视近代教育, 把学校教育和女子教育作为民众教化的重要渠道。

关键词: 郑观应 “立君为民” “亟行教养” 教育

中图分类号: C91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223X(2007)-02-0131-03

郑观应(1842-1922年), 字正翔, 号陶斋, 广东香山人, 1858年弃科举赴上海经商, 自开茶庄, 后在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任买办, 1880年以后先后担任上海机器织布局总办、轮船招商局总办、上海电报局总办等要职。他是早期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所著《盛世危言》产生了广泛的积极影响。他分析了当时君民隔阂、民隐不达的根源, 提出要“亟行教养”, 兴教化、启民智, 巩固国本。郑观应继承了传统的“立君为民”思想, 称“圣人之君人也, 勤民至矣”。圣人、君主, 是“天之道”的人格化, 是世俗社会一切秩序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他认为君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 君主必须努力寻求并保持与人民利益的同一, “蕴利生孽, 不利于民者终不利于君”。所以, 和谐的君民关系应该是“君之有民, 犹人骨之有肉, 体之有肢, 动息痛痒, 一气相通”, 如果君主对国事民瘼漠不关心, 对民生疾苦不管不问, 那么人民就会对君主失去信心, 不愿继续支持、爱戴君主, 社稷存亡也就全然不顾了, “民亦于束身免死之外不顾其他, 以为兵戎兴败, 司之者有武员; 国社存亡, 主之者有天意”(《盛世危言》)。

对于后世及当时的君民关系, 郑观应借用古人的话提出了批评,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乃天下之天下”, 说后世君主传贤之局变为世袭, 由“天下之天下”变为“家天下”, 以至于“中国权操于上, 冠履之辨最严, 降及嬴秦, 焚书坑儒以愚黔首, 直欲锢天下之耳目, 缚天下之手足, 惟所欲为, 呜呼酷矣”, 而“执持愈坚, 缚束愈甚, 于是天下之民气愈遏抑而不能伸, 天下之民心愈困穷而无所告”。^{[1]332}这严重违背了“立君为民”之道, “去古人利天

下之心愈远而愈失”。他警告说, 君主“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 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对于“君虽至不仁, 臣民必顺受无贰”的陈腐论调, 郑观应颇为反感, “信如斯也, 则是天之立君, 专为鱼肉斯民, 而天下兆民胥供一人之用, 有是理乎”(《盛世危言》), 认为君主必须勤政、爱民, 绝不能因一己私欲而误国殃民, 若“或假公而济私, 或挟私而废公”, 动辄以“兵力压人, 不行仁政”, 其结局只能是“或数传覆裂, 或及身俘虏”。^{[1]333-332}

郑观应指出, “中国不能自强, 在于上下离心”; 君主不能全面掌握和了解民生疾苦, 人民也觉得君主离他们太遥远。若要改变这种上下离心的状况, 则“非君民交泰不可。欲期交泰, 非上下一心不可; 欲求一心, 非君民公利不可”(《盛世危言》)。要做到这一点, 君主的责任是主要的, 他必须端正君心, 明确君责, 树立为天下役的信念, “君人者, 坎然视己为天下之人役, 适所以永为天下之人主; 侈然自为天下之人主, 终且求为天下之人役焉而不可得矣”, 如此, 才能“使为君者, 勿曰竭天下万民之利以养一人也, 而曰溥天下之利以养万民, 予一人分而给之, 总而理之斯可矣”(《盛世危言》)。

郑观应谆谆告诫为君者, “盖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 得众之要在乎见情”, 此可谓一语中的, 直捣封建政治制度之软肋。他进一步指出, 自孟子阐述“君为轻, 民为重”以来, 由于“后世昧于圣哲本旨”, 导致君民关系“自秦汉以降, 沦胥至今”, 造成“国本之不固, ……民生之不厚, 士气之不振”。^{[1]335}他强调指出, “中国病根在于上下不通”。^{[1]332}由此导致君民隔阂。如何使君民上下通情、沟通民意, 郑观应建议, “民以为不便者不必行, 民以为不可

收稿日期: 2006-11-24

作者简介: 张君玉(1967-), 女, 汉族, 海南万宁人, 海南广播电视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党委办公室、校长办公室主任。

者不得强”，^{[1]311}他论证欧美各国之所以“日跻富强隆治之域，国运蒸蒸乎不知其艾期”，根本原因就在于“不治民而与民共治也”。^{[1]311}

要改变君民相隔、民隐不达的状况，必须“力为图治，亟行教养”，把教化民众、整顿风俗当作非常紧迫的事情。郑观应一方面继承了传统的儒家伦理纲常，希望培养国民道德、规范社会行为，以重整社会的伦理道德秩序，抵制西方的文化侵略，另一方面突出强调了教育开启民众智慧、提高国民志识、改进民众生活的积极作用。

郑观应认为教养民众、开启智慧是君主天赋的职责，声称“夫天生民以教养，托之于君，故有家国天下者，其责无过于教养”，并举例说上古圣者频出，授民“精巧之法”、“觅食之术”、教民“稼穡畜牧之事”，才终使人脱离野蛮时期，进入文明开化时期。他十分赞同中国上古礼乐教化制度，说“古者悬书读法，以士礼乡饮酒化天下于尊亲礼让之间”，坚持教化宣讲内容“以圣谕要言为主，而以孔孟之道、程朱之学旁通曲畅”。他严厉批评后世以愚民弱民为目的的教化制度，说自三代以后君主各怀私心，不是想法设法教人明理、开启智慧，而是实行愚民政策，愚弄天下人，“为之俑者初以为天下之多事，皆豪杰为之也。遂谓天下人可愚不可智，民可使由不可使知，庶我之大业可世守，故凡能开人聪明启人智慧之事，悉欲抑而屏之”，并造成了“暴秦崛起，焚书坑儒，务愚黔首。明季制艺之科，专图锢蔽天下之人材”的局面。他指出，愚民教育的后果是严重的，人同禽兽，人材凋敝，“迨至蚩蚩失教，其不复等于禽兽者几希”，“三代以下，人材不世出，民生所以日促也”（《盛世危言》）。

郑观应解释了“亟行教养”的必要性。如果民众缺乏教养，没有道德规范和精神支柱，就会对国家造成危险，“生长乡闾不闻教化，耳目所蔽，习与性成矣。户口蕃衍，俯仰无资，饥寒所驱，铤而走险矣”。他认为农民起义的发生就是清政府“有民而不能自教”的结果。另外，他认为，如果统治者不重建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秩序，西方的文化侵略就有可能带来亡国之祸，“法兰西之君臣专以传教亡人之国，阴谋诡计，四海皆知。既已诱至南交，去越南如反掌矣！中国之户口四万万而终不自教，听外人取而教之，恐祸患之乘，更有非意料所及者”。因此，他希望把传统文化发扬光大，重振民心，重树国威，坚信“彼佛、老浮游之论，天方天主荒唐牵强之辞，何足与我中土圣道王言互相比拟？果得认真经理，他日太阳首出，燭火皆消，洪钟一鸣，万声皆寂。万姓既改恶从善，永无犯上作乱之萌，万邦亦一道同风，咸知学圣尊王之义”（《盛世危言》）。

从中外国家的兴衰对比中，郑观应认识到教养民众的重要意义，认为民众的教养程度直接关乎国家危亡，关乎国计民生，“横览环球各邦，其国运之隆替，莫不系乎人材，而人材之盛衰，莫不关乎教化。其教养有道者，勃然以兴；教养失道者，忽然以亡”。他认为欧美各国蓬勃兴盛的原因在于国民开化，民众无论贵贱都能受到教育，“故人之灵明日启，智慧日积，而人材济济，国势以强也”。

西方发达国家教养有道，使“士有教而民有养”，终致“人材众则百事兴”，科技日新，国运昌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安南等国家，君主不会、不愿教养民众，只用严刑峻法限制百姓，“上失教养之方，下无奋兴之士”，造成百姓流离失所，百业不振，国家一片衰败萧条景象。郑观应总结说，“此其教养失道，国势陵替，而先后沦亡如出一辙也”。他认为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也是“教养失道”，岌岌可危，“我中国教养之道，自三代以后渺矣无闻，政治民风江河日下。方今时事日非，国势益促，外有强邻环视，内有伏莽堪虞”（《盛世危言》）。

郑观应认为，教养之道直接关乎民众的基本物质生活状况，必须大兴格致之学。他指出，游牧耕牧已经解决不了当日的物质需要，“夫以上古游牧之时，耕牧之世，犹尚教养，况于今日地球之中已患人满，弋猎固无以为粮，而耕牧犹虞不给，教养诎可废乎”，所以，人类由游牧而耕牧，由耕牧而兴格致之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盖世界由弋猎变而为耕牧，耕牧变而为格致，此固世运之迁移，而天地自然之理也”，而格致之学参悟世界规律，是教养良方，“顾格致为何？穷天地之化机，阐万物之元理，以人事补天工，役天工于人事。能明其理，以一人而养千万人可，以一人而养亿兆人亦无可。我中国生齿四万万，人民甲于五大洲，予此元元，可不亟图教养之方哉”。于是，他明确提出了教养之方，“今日之计，宜废八股之科，兴格致之学，多设学校，广植人材，开诚布公，与民更始”（《盛世危言》）。

郑观应反复强调学校教育在教化人们、培养人才方面的重要性，说“学校者人才所由出，人才者国势所由强”，“国家之兴衰，系于人才，人才之优劣，出于学校”，而要兴学校，就必须废科举帖括之学，“不修学校，则人才不出，不废帖括，则学校虽立，亦徒有虚名而无实效也”。他认为，“培植之责任在于公学，而人才之优劣出于教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师范教育，培养教员“硕学通儒”，“能诲人不倦，循循善诱，不但教育有方，且于世界最新之卫生诸法靡不美备周详”，批评当时中国“师道日衰，教术日坏，无博学通儒克胜教习之任，无师范学校以养教习之材”（《盛世危言》）。

郑观应还高度重视女子教育，认为“教子婴孩，家庭教育最关重要”，而“妇人失教不知书理，其所生子女故不知教育之法”，若“其母知书识礼，必常依依膝下，事事教导，受益良多”。他指出“女学最盛者其国最强，不战而屈人之兵，美是也。女学次盛者，其国次盛，英、法、德、日本是也。女学衰，母教失，愚民多，智民少，如是国之所存者幸矣”，所以，“女学校乃当今急务救本之基”，这样，他就把女子教育提高到事关国家安危、社稷存亡的重要地位。对于幼儿教育，郑观应也特别重视，“我国而欲与列强竞争于20世纪之舞台，而不亟思讲求教育，不可也。讲求教育，学有专门，而不自幼童始，尤不可也”。^{[1]242}

为全面、系统地教化民众，郑观应提出仿照西方学制设立小学、中学、大学的三级学制系统，“设于各州县者为小学，设于各府省会者为中学，设于京师者为大学”（《盛

世危言》),采取班级授课形式,规定学习期限,并以考试结果作为升学标准。鉴于当时的现实,他“变通“地将科举制的进士、举人、秀才与大、中、小学校匹配,建议将各省、府、县的书院改为学堂,他也是国内最早倡导改书院为学堂的人。学制规定从小学开始实行分科教育,文科包括文学、政事、言语、格致、艺学、杂学,武科包括陆军和海军。

郑观应的“亟行教养”,借鉴、吸收了西方的合理形式,包容、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中西杂糅,古今并用,体现了近代先进思想的发展趋向,客观上起到了兴民

权、倡民利的积极作用。他也看到了兴教化、启民智的重要性和迫切性,提出兴办学校、改善民生的改革思路,这无疑是他比同时代人高明的地方。然而,郑观应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局限性;他的主体价值取向是保守的,没有脱离封建纲常礼教的范畴。他的想法只停留在形式的层面,没有产生实际的促进作用。格致之学虽能开启民众智慧,但离培养具有独立人格的人的目标还相差很远,学校教育改革也举步维艰,民众的教养尚需其它良方。对于古人不必苛求。其实,就所处的时代而言,郑观应已经走到了最前面。

参考文献:

[1] 夏东元 . 郑观应集 [M] .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2.

(责任编辑: 李莉)

Zheng Guanying 's Thought on Enlightenment by Education

ZHANG Jun-yu LI Feng
(Hainan Radio and Television University, Haikou 570105 China)

Abstract Zheng Guanying who carried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thought of "enacting law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opined that the demerit of separation between the lord and its subjects as well as of the concealment of people's injustice from the lord could only be redressed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enlightenment by education. Thus, on the one hand, he upheld the traditional Confucian moral principles and codes as the essentials of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mmon people in expectation of altering the situation of "severe shortage in enlightenment", and on the other hand, he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modern education regarding school education and education for females as the key channel of enlightening the common people.

Key words Zheng Guanying "enacting laws in the interest of the people"; "instructing people to be have themselves"; education

更 正

我刊 2007 年第 1 期刊登的《批评的踪迹与现代性测绘——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一种考察》一文,作者蔡志诚的工作单位应为华侨大学文学院。特此更正。